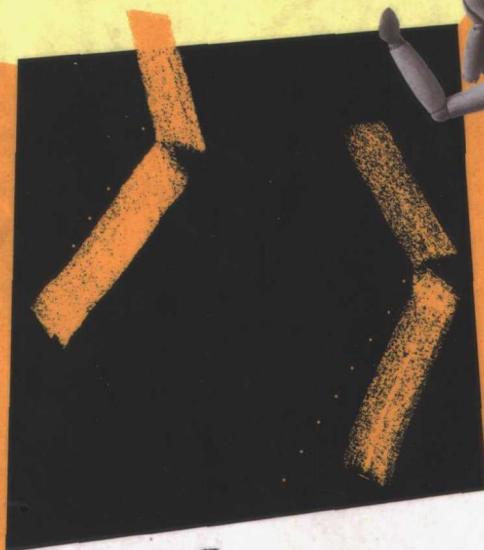


人类天

地具有生存发展的
烈愿望。但人类赖以在生存
的最基本的武器——认识能力却
不能绝对可靠地保证人达到目的。
认识之所以可能，在于人用一种
人的认识范畴结构了从外部世
获得的感性材料。由此组成的
广度有限、相对静止、人化
的人类认识之网只在深广无
限、变动不居的外部世界不发
非预料性变化时才具有时效
性。因此，在这种认识指导
下的有目的的生命活动都是
一定程度的冒险行为，成功
具有概率性。但是，有
生命意志也有生存发展
希望的人类并不因此放
弃生命，而是为展现
生命价值，争取可能
的成功含泪冒险前
进。这就形成了人
类生存处境的悲
剧性，找回生命
悲剧意识不一
能予人世俗
幸福上的幸

巨绝
命识



悲剧意识

程亚林 著
吉林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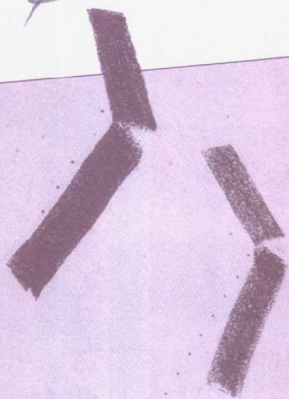
生命意识丛书

悲剧意识

是人类生命在生存的悲壮性的意识
是人类生命的根本性意识
它与生命同在

悲剧意识
含平等意识：人在
没有达到生存发展
目的时绝对可靠能
力、谁也不是也不可能
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这一点
上绝对平等。悲剧意识含自
由意识：人在既没有达到目的
的绝对可靠能力，又没有上
帝、他人可以依傍，但又不愿放
弃生存发展权利的情况下，只能
独立自主地承担生存发展
生存意志驱动下调动一
能力，焕发生命
的筹划、操劳展示
现存在的意义。
创造生命的可能，接受机
遇、命运，并以生死成败
不骄不馁地承受裁决的结果
承担不得不拥有也必须
承担的责任。只有
才能使人超越生存恐
发掘生命潜能，张扬生命
量，用生命去撞台机遇、
命运之门，为生存发展创造
可能。悲剧意识含博爱意识：
上述平等意识为人与人之间
产生同情、亲近、怜悯、
同舟共济等情感奠定了基
础，建立在同情基础上的
自由意识由于深知自由对
人的重要而必然包含尊
重他人自由权利的内
容，生成克制、自律等
道德力量和在不平等基础
上合作、维护人类共
同生活的爱的自觉。
博爱意识体现了人
不同于动物、耻
于同类相残的
尊严。

B022
4



生命意识丛书

悲剧意识

程亚林 著



00168826

- 8

吉林教育出版社
长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悲剧意识/程亚林著.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2001.4

(生命意识丛书)

ISBN 7-5383-4044-0

I. 悲… II. 程… III. 意识—研究 IV. B0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1371 号

出 版 人 / 邵恩成

策 划 人 / 韩 松

责任编辑 / 韩 松

封面设计 / 敬人设计工作室 吕敬人 + 魏梵

出版发行 / 吉林教育出版社

地 址 / 长春市同志街 55 号

邮政编码 / 130021

电 话 / 0431-5645968

传 真 / 0431-5645968

网 址 / jjpub.home.china.com

电子邮件 / jjpub.cn@sina.com

印 刷 / 长春新华印刷厂

版 次 /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1168 1/32

印 张 / 6.875

字 数 / 159 千字

印 数 / 1-3 000 册

定 价 / 15.50 元

作者序——正视生命的悲剧意识

悲剧意识是对人类生命在世生存的悲壮性的意识。生命悲壮性是由人类既有生存发展的强烈欲望又没有达到目的可靠能力，只能依凭追求生存发展的意志和有局限性的能力冒险在世这一生存处境决定的。生命一旦在世，必然首先意识到自身悲壮性的生存处境，具有悲剧意识。悲剧意识是人类生命的根基性意识，它与生命同在，尽管因为复杂的原因常被种种妄念所遮蔽。

人类天然地具有生存发展的强烈欲望。但人类赖以在世的最基本的生存武器——认识能力却不能绝对可靠地保证人达到目的。认识之所以可能，在于人用一种属人的认识范畴结构了从外部世界获得的感性材料。由此织成的深广度有限、相对静止、人化了的人类认识之网只在深广无限、变动不居的外部世界不发生非预料性变化时才具有有效性。因此，在这种认识指导下的有目的的生命活动都是一定程度的冒险行为，成功只具有概率性。但是，有生命意志也有生存发展希望的人类并不因此放弃生命，而是为展现生命的价值，争取可能的成功含泪冒险前进。这就形成了人类生存处境的悲壮性，形成了生命的悲剧意识。



悲

剧

意

识

悲剧意识蕴含平等意识。人在没有达到生存发展目的的绝对可靠能力，谁也不是也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这一点上绝对平等。

悲剧意识蕴含自由意识。人在既没有达到目的的绝对可靠能力，又没有上帝、他人可以依傍，但又不愿意放弃生存发展权利的情况下，只能冒险地、独立自主地承担生存发展的责任：在生存意志驱动下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能力，焕发生命力量，通过不懈的筹划、操劳展示生命的价值，显现存在的意义，创造生存发展的可能，接受机遇、命运的挑战，并以生死成败不骄不悔的心态承受可能的结果。这是人不得不拥有也必须拥有的自由和必须承担的责任。只有自由，才能使人超越生存恐惧，发掘生命潜能，张扬生命力量，用生命去撞击机遇、命运之门，为生存发展创造可能。

悲剧意识蕴含博爱意识。上述平等意识为人与人之间产生同情、亲近、怜悯、同舟共济等情感奠定了基础；建立在同情基础上的自由意识由于深知自由对人的重要而必然包含尊重他人自由权利的内容，生成克制、自律等道德力量和在平等基础上合作、维护人类共同生活的爱的自觉。博爱意识体现了人不同于动物、耻于同类相残的尊严。

因而，在世生存的人类生命本真的生存方式是：在既不依傍、盲从、受制于他人又尊重他人自由权利的前提下，独立自主、充满尊严地承担为生存发展而冒险的责任，展示生命的价值，呈现存在的意义，创造并承受可能的生活。它召唤既无奴颜媚骨又无凌

人霸气、独立自主、敢于负责的人格，孕育坚毅弘忍、豁达幽默的人生态度，培养以平等、自由、博爱原则为生命原则、充满正义感的灵魂。正是具有这种人格、态度、灵魂，按本真方式生存的人用无数次冒险、无数次牺牲换来的成功，才创造了人类自身，才建构了愈来愈广阔的人化世界。

当然，本真的生存方式也展示了生存意志与生存能力尖锐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暴露了人类生存困境。它时时刻刻将生死成败的抉择摆在人的面前，压在人的心头，但它在肯定“没有生存意志必然死亡”这一必然性的同时，却不肯定“有生存意志必然生存”的必然性，而是让不愿放弃生命的人们超越自身能力，“荒谬”地承担起并不必然胜任的责任，冒险地为生存发展而艰苦奋斗。它既不为人提供承担、决断、承受的充分理由，又拒绝对人的奋斗作出完美圆满的承诺，还苛刻地禁止有尊严感的人采取剥夺他人自由权利的方式来达到自身目的。它将人逼上的是一条险仄之径。

正因为如此，有强烈生存发展欲望又没有达到目的的人绝对可靠能力的人不可能不产生种种幻想：或者妄图通过迷信的方法和否定自身局限性、夸大自身能力的方法，幻想自己全知全能；或者妄图通过夸大自身局限性，否定自身能力的方法，幻想自己无知无能而又能超越死亡，进入某种“自由”境界（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全知全能）。这当然都是在追求不可能的生活。作为一种朴素的、用来鼓励自己在艰困世界生存下去的观念，它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曾给过人们勇



气和安慰，无可厚非，但一到人化世界拓展到相当范围，人们可以按照某种传统习惯过比较稳定的生活，可以通过剥夺他人的自由权利来达到自身生存发展目的的时候，这些朴素的幻想却被所谓的“强者”、“智者”利用，建立了种种哲学和宗教观念。他们或者宣称人可以在某个圣哲的指导下运用某种学习、修养的方法进入全知全能之境；或者宣称人可以在另一些圣哲指导下通过某种修行弃知绝能，进入事事无碍的“逍遥”或“涅槃”之境，并以此相蛊惑，建立了“强者”、“智者”对世俗世界和宗教世界的专制统治。由于伪造了先知先觉、全知全能的神化人和绝对真理，以它为根据制定了种种标准，将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无知无觉或圣贤、庸众、愚氓等若干等级，就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样，不平等观念、以剥夺他人自由权利为手段来达到自身目的的野蛮行径、世俗界和宗教界森严的等级制度都合法化了，自由也蜕变为对他人自由权利的任意侵犯、剥夺而成为部分人甚至个别人的特权，成为部分人甚至大多数人的禁裔。与此同时，这两部分人也都在坑蒙拐骗或压抑屈辱中因不能充分健康地展示生命的价值，显现存在的意义，只能在自我疏离和混战恶斗中浪费生命，而以不同的方式走上了异化之途，不同程度地遗忘了以生命悲剧意识为根基的平等自由博爱意识。人类从此堕入深渊，世界因此陷入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现实生活中不断涌现的悲剧性事件以铁的事实揭露上述哲学和宗教以及以它们为基础而建立的专制体制的虚伪，在提醒人们不能再堕入自欺的陷阱，在启迪人们对人类

在世生存的根本处境的思考。面对悲剧性事件,人们不能不问:人在本质上全知全能吗?人能够全知全能吗?人能够按照某种哲学或宗教的方法进入不同形式的全知全能之境吗?

但是,即便如此,由于长期受上述哲学和宗教的蒙蔽和与之相应的专制体制的压抑,人们对悲剧性事件产生的根本原因的认识依然经历了艰苦的思考过程,甚至直到今天,人们对人类悲剧性与悲剧性现实二者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仍然模糊不清。

基于此,本书试图探索这些问题。

由于先进的知识分子对现实中的悲剧性事件、人类悲剧性处境最为敏感,由于真正的文学悲剧总是以极为严肃的态度在探索人在宇宙间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以极大的热忱关注人类生存处境和人间公义,所以,本书拟从清理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学悲剧、人类悲剧性处境的认识切入,展示他们对悲剧问题的思考,并兼及西方传入的相关理论与思潮,来探讨上述问题。这里,有史的叙述和个案研究,也有笔者的思考。总的目的是让读者通过对悲剧思想史和相关面的把握,具体而又深细地体悟生命的悲剧意识,并认识到:只有生命悲剧意识的普遍复归,平等自由博爱意识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建构才能找到切实的根基。

促使本书艰难完成的也许是这样一种信念:找回生命悲剧意识不一定能予人世俗意义上的幸福,但拒绝正视生命悲剧意识的人在人格精神上必然不幸。

但愿读者与我共鸣。

目录

作者序——正视生命的悲剧意识	1
----------------	---

第一章	001
黎明前的呐喊	

[1 节] 鼓吹新民,重铸国魂 [2 节] 审
视戏曲,呼唤改革 [3—4 节] 剧界多
喜剧,社会多惨剧 [5—6 节] 平和之
破,人道蒸也 [7—19 节] 解脱与建构

第二章	061
新文化阳光下的思索	

[1 节] 人无时无地没有伤心的境地
[2—10 节] 悲剧将有价值的东西毁
灭给人看 [11—17 节] 命运与生命力
的永恒冲突



第三章 |

137

没有悲剧与悲剧的报复以及 沉重的反思

[1 节] 言论·回应·恶果 [2 节] 社
会政治和语言层面的反思 [3 节] 正
视人的“文革处境” [4—8 节] 历史文
化层面的反思

第四章 |

171

西学的启示

[1 节] 新潮涌起 [2 节] 高扬生命体
验 [3 节] 追寻本真存在 [4 节] 承担
自由苦刑 [5 节] 游戏中的悲壮 [6
节] 唤醒悲剧意识,走向哲学的人学

后记

209

第一章

黎明前的呐喊

从思想史的意义说,中国 20 世纪的大门是知识分子用带血的头颅撞开的。菜市口的一片血光,戊戌君子的六颗头颅,不仅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制度绑在历史耻辱柱上,而且将上下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灵魂推上了历史审判台,让每一个活着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将它们一一审视,一一考问。人们猛然发现:“更历千岁”的中华“巨厦”的确已“瓦礫毁坏,梁栋崩折”,有“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的危险;“酣嬉酩酊,漠然无所闻见”,“束手待毙,不思拯救”,“补苴罅漏,弥缝蚁穴”的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必须“破坏”,必须重建。其中,通过对悲剧问题的思考,直面满目疮痍的现实,剖析伤痕累累、黑雾弥漫的灵魂,甚至打破人生幻想,建构新的生存方式,以期达到“新民”、建设“新国魂”的目的,就是不少知识分子孜孜不倦从事的工作。正是这些黎明前黑暗中的思考和呐喊,使中国带血的 20 世纪肇端伊始就负载了史无前例的内容和分量,也为新文化曙光的展露作了思想准备,为关于悲剧问题的思考提出了许多需要辨析、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

1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东渡日本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之一



梁启超痛定思痛，想到了改良国民素质和唤起民众实行革命破坏的问题。

1902年，他在《新民说》的叙论中说：

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求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

的确，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即如梁启超的朋友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变法失败完全可以东渡日本以求保全生命之时敢于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就已惊天动地。然而，戊戌变法失败了，历史上历次起义、改革也都失败或蜕变了。许许多多前仆后继战斗的“中国的脊梁”们“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专制统治者的阴险残酷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民众因中专制文化之毒甚深而不觉悟，也是重要原因。民之于国，的确好像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与“一身”的关系，没有肢断血涸而能存身的道理，也没有民愿心死而能立国的道理。因而，摄生以强身，新民以荣国，就是每个有维新、革命思想的人面对戊戌悲剧不能不反省、思考的问题。

* 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6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1

** 梁启超。殉难六烈士传。见：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6专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109

*** 鲁迅。且介事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见：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18

于是,梁启超比较中西文化,提出改善民德、民智、民力的主张,批判中国不讲进化、不求进步、保守落后的国民性。探本溯源,他认为“大一统而竞争绝”、“环蛮族而交通难”、“言文分而人智局”、“专制久而民性漓”、“学说隘而思想窒”是形成落后国民性的五大原因。前二者出自“天然”,后二者原于“人事”。他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讲“天赋人权”,讲“人道”：“天生之而赋此权利之智识,且赋以扩充此权利之智识,保护此权利之能力。故听民自由焉,自治焉,则群治必蒸蒸日上;有桎梏之、戕贼之者,始焉窒其生机,继焉失其本性,而人道几乎息矣。”但中国长久的专制政体,培养的却是“私天下为一姓之产”的“霸者”和“不顾公益”、“自居于奴隶盗贼”的国民,所以“群治不进”。他又说:“凡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皆其子孙也。”但中国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只有“缘饰孔教,利用孔教,诬罔孔教”以束缚国民,“自贼而贼国民”的文化,所以,“全国之思想界消沉极矣”。这就使中国到了非“破坏”不可的程度:“当夫破坏之运之相迫也,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破坏既终不可免,早一日则受一日之福,迟一日则重一日之害。”他主张:“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重粉之,使数千万如虎如狼如蝗如螭如蠹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凭借,然后能涤荡肠胃以上于进步之途也;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使数百万如蠹鱼如鸚鵡如水母如畜犬之学子,毋得摇笔弄舌,舞文嚼字,为民贼之后援,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进步之实也。”这的确像如磐暗夜中的呐喊,引起了主张维新、革命的人士对国民性,保守与进步,专制与自由,改良与破坏的注意。

同时,他还提出了建设新的国民精神的问题。他认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法律道德,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



志

剧

意

识

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而要保持这种“特质”，还要“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并不断加以淬厉、濯拭、锻炼、培浚，以求岁岁有新芽之茁，息息有新泉之涌。

与之相呼应，1903年，进步杂志《浙江潮》、《江苏》又先后发表《国魂篇》和由资产阶级革命派著名文学家金天翮（署名金一）撰写的《国民新灵魂》，主张建设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它们或者说：“一民族而能立国于世界，则必有一物焉，本之以特性，养之以历史，鼓之舞之以英雄，播之于种种社会，扶其无上之魔力，内之足以统一群力，外之足以吸入文明与异族抗。其力之膨胀也，乃能转旋世界而鼓铸之，而不然者，则其族必亡。兹物也，吾无以名之，名之曰国魂。”或者说：“是故特殊之灵魂足以代表一群，多数之灵魂足以代表一国，有华美高尚樱花之魂，而日本以之名其国也；有凌厉鸷荒鸷之魂，而俄罗斯以之名其国也；有高掌远蹠神奇变化猛狮之魂，而英吉利以之名其国也。夫国而无魂，乃以陈死之人而充国民之数矣，可乎哉？”

但是，他们看到的却是中国大地充斥着种种愚昧怯弱的旧灵魂。金天翮在《国民新灵魂》中描写道：

梦屢于官，词吃于财，病缠于烟，魔着于色，寒噤于鬼，热狂于博，涕糜于游，店作于颤，种种灵魂，不可思议。而于是国力骤缩，民气不扬，投间抵罅，外族入之，铁鞭一击，无敢抗者，乃为奴隶之魂，为仆妾魂，为囚虏魂，为倡优魂，为饿殍待毙一息之魂，为犬马豢养摇尾乞食之魂，而簪其府，而徘徊其都市，则商黯其色，工卒其容，农喘其息，士淹其气。悲风吹来，四山落叶，晚景袭人，灯烛无光，暮气入床，沉冥石室，乃魂之房。耗矣哀哉！中国魂，中国魂！

这是说，在中国大地上游荡的都是一些为官、为财、为烟、为

色而梦吃风魔的人物，他们怕神怕鬼，自由散漫，疾病缠身，而又为蝇头小利进行狂热的赌博。一当外族侵入，便乖乖听命，降为奴隶、仆妾、囚虏、倡优，以摇尾乞怜的方式维持奄奄一息的生命，没有丝毫凛然正气。

而这一切，又来源于专制制度的压迫。发表在《国民报》第二期的《说国民》一文说：

且也今日之中国，报馆有禁，出版有禁，立会演说又有禁，倡公理则目为邪说，开民智则诬为惑人。坐是种种，而中国国民之种子绝，即中国人求为国民之心死。故父以戒子，师以率徒，兄以诏弟，夫妇朋友之相期望，莫不曰安分、曰韬晦、曰柔顺、曰服从、曰做官、曰发财。故卒举国之人而无一不为奴隶，即举国之人而无一可为国民。

这种情况当然亟待改变。因而，一时间，“中国之国魂安在乎”，“国魂乎，盍乎归来乎”的悲怆呼号此起彼伏，鼓吹建设冒险魂（山海魂）、宗教魂（魔鬼魂）、武士魂（军人魂）、游侠魂、平民魂（社会魂）等等新灵魂的倡议也响彻中华大地。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开始注意到悲剧问题。

2

1902年，戊戌变法领袖人物康有为的学生，历任《时务》、《知新》、《清议》三报主笔的欧榭甲*远赴美国任《文兴报》记者。这位“文学优长，议论豪放”，在国内“极受时人所称赏”的记

* 欧榭甲，生卒年月未详。以“无涯生”为笔名撰《观戏记》一文，此事之考证见：王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近代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681（注①）



者到美国后面对先进的西方文明,反思国内种种现象,自然感慨良多。使他惊讶的一件事是:在旧金山华人圈子里看广东戏,发现身处美国、理应接受西方文明的华人迷恋的戏剧依然是中国传统的“前朝遗曲”。其形式是“旧曲旧调、旧弦索、旧鼓锣”,其内容是“红粉佳人,风流才子,伤风之事,亡国之音”,简直使人“不忍卒观”。于是,他以“无涯生”为笔名,撰写《观戏记》一文,发表在1903年旧金山《文兴报》上,鼓吹中国戏曲“不可不大加改革”。文章首先介绍法国和日本戏剧,说明反映现实悲惨事件的戏剧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巨大的社会作用,并以此为例证强调中国戏曲改革的必要性。他回顾说,法国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失败时,“其哀惨艰难之状,不下于我国今时”,但是,当时举国上下“欲举新政”,乃于巴黎建造剧场,搬演普法战争失败的惨剧,以激励民心,鼓舞斗志。他描写观众在观剧时的表现说:

凡观斯剧者,无不忽而放声大哭,忽而怒发冲冠,忽而顿足捶胸,忽而摩拳擦掌,无贵无贱,无上无下,无老无少,无男无女,莫不磨牙切齿,怒目裂眦,誓雪国耻,誓报公仇,饮食梦寐,无不愤恨在心。

又称赞惨剧发挥的社会作用说:

故改行新政,众志成城,易如反掌,捷于流水,不三年而国基立焉,故今仍为欧洲一大强国。演戏之为功大矣哉!

接着,他又叙述他在日本观看描写明治维新初年艰难状况的戏剧所见到的情景:

日本人且看且泪下,且握拳透爪,且以手加额,且大声疾呼,且私相耳语,莫不曰我辈得有今日,皆先辈烈士为国牺牲之赐,不可不使日本为世界之日本以报之。

他的感想则是:

记者旁坐默然而心语曰:为此戏者,其激发国民爱国之

精神，乃如斯其速哉？胜于千万演说多矣！胜于报章多矣！

由此，他将外国戏剧改革成功的例子与他在旧金山看到的广东戏以及整个中国传统戏曲相比照，在分析了后者的源流、演变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凡“陈腐之曲本、海淫海盗之毒风”，只可能“伤风败类”，而只有仿效外国戏剧的“贤人君”之作，才能“为移风移俗之助”。

他发现，当时中国戏曲改革也已露出了一线曙光，汪笑侬^{*}撰写的影射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害的戏曲《党人碑》就是戏曲改革的先声：

近年有汪笑侬者，撮《党人碑》，以暗射近年党祸，为当今剧班革命一大巨子。

他为这个令人惊喜的事实欢呼道：

意者其法国日本维新之悲剧，将见于亚洲大陆坎？

文章最后，则用更为铿锵有力、语重心长的语言号召改革戏剧以改造和振兴中国：

蒋心余^{**}之言曰：天下之治乱，国之兴衰，莫不起于匹夫匹妇之心，莫不成于其耳目之所感触。感之善则善，感之恶则恶，感之正则正，感之邪则邪。感之既久，则风俗成而国政亦因之固焉。故欲善国政，莫如先善风俗；欲善风俗，莫如先善曲本。曲本者，匹夫匹妇耳目所感触易入之地，而心之所由生，即国之兴衰之根源也。记者曰：蒋君其知本哉？虽然，其特此哉？夫感之旧则旧，感之新则新，感之雄心则雄心，感之暮气则暮气，感之爱国则爱国，感之亡国则亡国，演戏之移易人志，直如镜之照物，骹之染衣，无所遁脱。论世者谓学术有左右世界之力，若演戏者，岂非左右一国之力者

* 汪笑侬(1858~1918)，近代戏曲家。

** 蒋心余(1725~1785)，即蒋士铨，清代戏曲家、文学家。